

论当代少数民族汉语作家的多重文化素养

杨彬 李勋¹

【摘要】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语境中，当代少数民族汉语作家具有多重文化素养，包括本民族文化素养、汉文化素养和西方文学素养，这三种文化素养在少数民族汉语作家身上交融在一起，正好契合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表达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特色，展示了少数民族作家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努力和贡献。

【关键词】少数民族 汉语作家 文化素养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54X（2021）07—0109—05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语境中，当代少数民族汉语作家具有多重文化素养，包括本民族文化素养、汉文化素养和西方文学素养，这三种文化素养在少数民族汉语作家身上交融在一起，形成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汉语作家不同于汉族作家的独特的文化素养。他们掌握了本民族的文化，也掌握了汉族的文化，形成跨文化思维。少数民族汉语作家因为具有娴熟的汉语能力，他们可以用汉语描写少数民族文化生活，表达少数民族的思维和观念，描写少数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心路历程和少数民族在接受汉文化和西方文化素养过程中发生的不同变化等，因此少数民族汉语作家具有多重文化交融的特色。少数民族作家的这种多重文化素养，正好契合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表达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特色，展示了少数民族作家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努力和贡献。

一、本民族文化素养：传承和传播民族文化的动力

当代少数民族汉语作家最基本的素养是本民族文化素养。少数民族汉语作家的民族文化素养主要来源于他们的民族，来源于他们的血脉，来源于他们从小就耳濡目染的民族文化，来源于他们对自己民族血缘的不懈追寻，来源于他们传承和传播本民族文化的不竭动力。当代少数民族汉语作家获得民族文化素养有几种不同的途径。

第一，在少数民族地区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汉语作家的少数民族文化素养与生俱来。

在少数民族地区度过青少年时期的少数民族汉语作家，从小耳濡目染少数民族文化，本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文化深深镌刻在心灵深处。他们具有本民族独特的看待万物和世界的思维。少数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作家的根本文化素养，少数民族汉语作家对本民族的历史进程和文化源流有深刻的了解，对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外在形式和内在灵魂有充分的认识。从小在自己民族的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中长大，热爱自己的民族，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他们的长处是非常熟悉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现状，短处是太过于执着自己的民族文化，缺乏更远的眼光和视觉。当他们拿起笔来，他们首先观照的是自己的民族文化民族生活，因此他们的作品就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特色。这类作家主要包括 1950 至 1970 年代的少数民族汉语作家，也包括少部分 1980 年代的少数民族汉语作家。从 1950 年代走上文坛的少数民族汉语作家在青少年时期大都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比如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彝族作家李乔、壮族作家陆地等，他们是因为参加革命或者参加工作才走出少数民族地区，在青少年时期对本民族生活耳熟能详，在浓郁的民族风俗风情中成长，形成了本民族的文化思维和本民族的民族意识。1980 年代走上文坛的少数民族汉语作家在青少年时期也主要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他们大都是因为参加高考到内地上学或者参加工作才离开少数民族地区。比如藏族作家扎西达娃、阿来，瑶族作家蓝怀昌等。他们都因为在少数民族地区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对本民族文化熟悉程

¹**作者简介：**杨彬，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4；李勋，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4。

度很高，他们一开始写作，就描写自己熟悉的少数民族生活，以自己的民族生活作为题材，希望能用自己的笔描写和反映自己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写作具有少数民族意识和少数民族特色的作品，因此他们创作的少数民族小说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特色。这些少数民族汉语作家具有来自骨子里的民族文化素养。这种少数民族文化素养使得他们和汉语作家有了鲜明的差异，也使得他们的小说有了鲜明的少数民族特色。

第二，在汉族地区或杂居区出生并成长的少数民族汉语作家，他们的民族文化素养源于他们对自己民族血脉的追寻。

这类少数民族汉语作家主要是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他们具有少数民族身份，但他们因为不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而是在汉族或杂居区生活，因此他们从小受到的汉族文化影响大于本民族的文化影响，他们生活在大都市之中或者远离民族聚居区，属于离开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少数民族。但这类汉语作家大都生活在传统的少数民族家庭，因为家庭的影响，因为父母的言传身教，他们从小接受了自己民族的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因此他们热爱自己的民族，时刻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比如回族作家张承志、霍达，满族作家朱春雨、赵大年等。这些少数民族汉语作家在写作时，一开始并没有写作少数民族生活或少数民族意识的小说，而是先写作了很多没有少数民族生活和少数民族意识的甚至是汉语意识和汉族题材的小说。但是他们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写作后，对本民族的热爱、对自己民族血脉的追寻成为一种动力，使得他们回归自己的民族，追寻自己的民族血脉，开始自己民族的文学创作。比如回族作家霍达，早期主要创作电影文学作品《秦皇父子》《鹊桥仙》，小说《红尘》《未穿的红嫁衣》等，这些作品并没有描写和表现回族生活、回族意识。但是回族的血脉最终牵引着霍达去观照回族的生活、探询回族的心灵，因此，1988 年，霍达在发表了很多非回族小说以后，用汉语创作发表了她的第一部回族小说《穆斯林的葬礼》，这是一部具有浓郁回族特色和回族意识的长篇汉语小说，是霍达回归、追寻其母系民族的血脉在小说写作上的成功。又如满族小说家朱春雨，他最先进入读者和评论家视野的是他的军旅小说，一般评论家都称朱春雨为著名的军旅作家。他创作的《沙海绿荫》《亚细亚瀑布》《橄榄》等是新时期军旅小说的重要收获，当然这些作品没有任何满族特色和满族意识。但是，朱春雨是满族人，是正蓝旗乌苏额尔敦氏的子孙，他的血缘牵引着他走向他的母族，1989 年他发表了小说《血菩提》，这部作品饱含对自己母族的热爱，描写了满族的一个分支——巴拉人的历史变迁、生活状态和民族意识。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张承志、赵大年，这些少数民族小说家虽然从小不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生活，青少年时期没有全面接受本民族的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的熏陶。但他们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血脉牵引着他们追寻自己母族的历史，深入到自己的民族文化深处，去描写自己民族的生活和心灵，去表现自己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这类少数民族汉语作家是很突出的一类。他们从小远离少数民族地区，但是他们的民族血脉和民族意识总会牵引他们走向本民族，写作少数民族汉语小说，传承和传播少数民族文化。随着现代化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很多少数民族成员将离开聚集区到杂居区或大都市生活，因此这类主动追溯自己民族血脉的作家，逐渐成为新时期以来创作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主流，用汉语写作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也成为传承与传播少数民族文化的主要方式。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是少数民族文化生生不息不断发展的传承人。比起生活在聚居区的少数民族作家来说，这些少数民族作家具有更清晰地传承和传播少数民族文化的意识、具有更强烈表达少数民族意识和少数民族身份的愿望，因而也就更具有传承和传播少数民族文化的能力。

二、汉文化素养：表达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举措

中国是一个有着 56 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在 56 个民族中汉族人口最多，占到 92%。汉族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凝练和发展具有强大力量，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的影响很大。汉文化不仅在汉族地区传承和传播，而且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也以不同方式进行传承和传播。文化和语言有深刻的联系，汉语本身就承载着汉族文化。当代少数民族汉语作家都或多或少接收过汉族文化的影响，具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

1950—1970 年代开始创作的少数民族汉语作家，他们都出生在少数民族地区，青少年时期都生活在自己的民族地区。他们的汉文化素养伴随着他们学习汉语的过程不断提高。不同的少数民族接收汉文化素养的途径和程度各不相同。拥有自己语言和文字的少数民族作家，他们学习汉语和他们的革命经历有关。他们当中很多作家是在参加革命事业或者参加工作后才开始学习汉语的，他们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逐渐接受汉族文化，并在学习汉语过程中开始接触汉语新文学的经典文学作品，接收传统汉

文学和汉译西方文学经典作品。在学习汉语、汉族文学作品、西方文学作品过程中培养了文学能力。这些汉语经典文学作品开启了这些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理想，他们开始用汉语描写自己的民族生活。比如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原先只读过几年蒙文书，他参加八路军后在战争的间隙努力学习汉文，进入到内蒙古文工团工作后，大量阅读了鲁迅、郭沫若、托尔斯泰、高尔基等文学名家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都是汉语作品或者翻译成汉语的作品。这些文学名著启迪了他的文学智慧，于是他使用汉语创作了《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茫茫的草原》等汉语小说。玛拉沁夫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少数民族汉语写作者，他自己说是用蒙语思考用汉语表达，也就是用汉语表达蒙文的意义，形成一种少数民族作家在进行汉语写作时，在头脑中进行“民汉”之间思维和语言转换的新的写作途径。有语言没有文字或者解放后新创文字的少数民族，在解放前就实行汉语教育，因此这些少数民族作家从小就受到汉语教育，他们在生活中浸染少数民族文化，在教育中接受汉族文化。比如壮族作家陆地在青年时期考上了广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青年时期开始直接接受汉语教育。1938 年到达延安后，系统学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和文学专业知识，陆地的汉语水平很高，汉族文化素养也很高。陆地在 1948 年就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北方》，这部小说集并没有壮族特色。但是他 1960 年出版的小说《美丽的南方》是用汉语描写的壮族人民土地改革的故事，具有鲜明壮族特色。以后他一直致力于壮族汉语小说的写作，1980 年他又出版了长篇壮族小说《瀑布》，这部小说获得了 1981 年少数民族文学奖。还有部分少数民族作家，处在杂居状态，平日的的生活就和汉族交融在一起，因此他们在受到本民族文化的熏陶时，也受到汉族文化熏陶，而且他们受到的教育主要是汉族教育。比如土家族小说家孙建忠，少年时代在湘西土家族地区就接触汉族文化，他少年时代念的是“私塾”，接受的是典型汉族文化教育，因此孙建忠具有双重文化素养。一方面他出生在土家族家庭，居住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土家族风俗习惯、历史传说给予他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素养，但他从小接受的是汉族教育，因此他具有很高的土家族文化素养和很高的汉族文化素养，这种双重的文化素养使得孙建忠写作汉语土家族小说得心应手。

1980 年代后开始写作的少数民族汉语作家，他们有的出生在少数民族地区，有的出生在汉族地区、杂居区或者大城市，他们的汉族文化素养高于 1950 年代开始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因为他们大都接受过高等教育，中国的高等教育基本是用汉语教学，因此他们的汉语水平相当高，有的达到了娴熟的地步。出生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作家，他们具有与生俱来的少数民族文化素养，但他们从小接受汉语教育，并且大都接受了高等教育，他们的汉语水平很好，因此他们的汉族文化素养比玛拉沁夫们要高得多。比如藏族作家降边嘉措，1954 年他 15 岁时被送到西南民族学院学习。在大学期间，他大量地阅读了中国文学名著和世界文学名著，接触大量的汉族文学作品，尤其是汉族汉语小说《新儿女英雄传》给予他很大的影响。他于 1980 年发表了用汉语写作的藏族小说《格桑梅朵》。藏族作家益西单增出生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贫苦家庭，1951 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57 年进入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学习，在大学期间阅读了大量的汉族文学作品，也接受了汉族文化，他用汉语创作了藏族小说《幸存的人》《迷茫的大地》等。而出生在杂居区或都市的少数民族汉语作家，他们的汉语水平和汉族人几乎没有两样，他们的少数民族小说汉语写作的特点是用汉语去追寻本民族的血脉，他们使用汉语非常娴熟，不仅能流利地使用汉语，还能对汉语进行创新，增加汉语的少数民族文化内涵。藏族作家阿来出生在四川西部藏区的马尔康县，是一个汉藏文化结合的地区，他在小学、中学、师范学校都学习汉语，接受汉语教育。因此阿来具有与生俱来的藏族文化素养，同时后天又习得了丰富的汉族文化素养。正如阿来说：“正是在两种语言间不断穿行，培养了我最初的文学敏感，使我成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¹阿来接受汉语文学的滋养，也接受藏族文化的滋养，藏族文化和汉族文化合并成一种独特的文化资源深深地滋养着阿来，形成阿来独有的其他人难以企及的跨文化写作资料。阿来说：“不管我们属于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中的哪一个民族，只要你用汉语进行创作，就要从这个传统中寻求启示和滋养……所以，我非常乐于承认自己通过汉语受到汉语文学的滋养。”⁽²⁾阿来对汉文化素养的认识，代表了少数民族作家对汉族文化资源的认识，也说明了中国少数民族作家运用汉语写作的缘由。阿来的《尘埃落定》就是在藏族文化、汉族文化和外国文学的共同影响下写出的著名藏族汉语小说。因此他的藏族小说的汉语写作具有丰富的跨文化特色，是少数民族作家运用汉语写作少数民族小说的成功范例。在自己民族的文化素养和汉文化素养共同滋养下的少数民族汉语作家，将汉文化资源运用到描写和表达少数民族生活、少数民族情感和少数民族意识中。少数民族汉语作家创作了一种跨越两种文化、融合两种文化而形成的既具有本民族特色又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从而给中国文坛带来一种颇具陌生化效果和新鲜感的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作品，扩展了中国文学的表现领域，并且对于表现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三、外国文学名著滋养：少数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途径

当代少数民族汉语作家除了具有本民族文化素养、汉文化素养之外，还受到外国文学的滋养，而最突出的是外国文学名著的滋养。1950 年代开始汉语写作和 1980 年代开始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接受外国文学名著的滋养具有不同的特点。

1950 年代开始写作的当代少数民族汉语作家，在他们接受汉文化汉文学滋养的同时，也接受了外国文学滋养。他们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开始接触很多汉译世界文学名著。与我国 1950 年代的时代一致，他们此时接触的外国文学作品主要是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名著和苏俄文学作品。比如玛拉沁夫在青年时期阅读和学习了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高尔基、肖洛霍夫等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培养了玛拉沁夫的文学素质、启发了他的创作热情。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开启了玛拉沁夫的视野，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方法，成为玛拉沁夫小说创作的“良师”，也直接影响到玛拉沁夫的创作风格。我们从玛拉沁夫的小说中可以看出其受到肖洛霍夫、高尔基等人的影响。玛拉沁夫创作《茫茫的草原》受到了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的影响，可以说《静静的顿河》开启了他创作《茫茫的草原》的冲动，哥萨克草原和蒙古草原的相同之处引发玛拉沁夫描写草原的热望。同时《静静的顿河》还给予了玛拉沁夫艺术上的直接指导。彝族作家李乔，1930 年代在上海受左翼文艺运动的影响，阅读了很多苏联优秀文学作品，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文学滋养。壮族作家陆地，在就读广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期间，广泛阅读了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尤其是阅读了西方很多现实主义文学名著。他非常喜欢高尔基的作品，创作散文和诗歌就是受到高尔基的影响。可以说苏联文学名著开启了他的文学智慧，成为他写作中不可或缺的外国文学素养。

1980 年代开始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他们接触外国文学的途径十分丰富。新时期以来，西方现代、后现代思潮如潮水般涌进中国，使得中国作家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就能接触到西方近一个世纪的文学作品。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学思潮不仅对汉族文学给予很大的冲击，也对少数民族文学给予全新的影响。新时期外国文学对少数民族汉语作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学的影响。存在主义、符号学、结构主义、意识流、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创作给很多少数民族汉语作家提供了除现实主义之外的新方法。少数民族汉语作家们发现，用这些现代、后现代手法描写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思维、宗教生活和意识更加得心应手。因此，一批 1980 年代走上文坛的少数民族汉语作家开始借鉴现代、后现代文学创作手法，深入挖掘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之根，描写少数民族独特的精神世界。比如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就采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描写藏族奇异自然、民族风情和神秘的宗教文化，创作了一系列具有魔幻色彩的藏族汉语小说，比如《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西藏，隐秘岁月》《去西藏的路上》等作品。他采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将西藏描写得亦真亦幻，将西藏的历史、现实、神话、宗教、传说融为一体，然后用魔幻的形式再现出来，创造出具有浓郁藏族文化特色的魔幻氛围。阿来的文学视野非常宽泛，他阅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其中美国当代文学对他影响最大。他说：“对我个人而言，应该说美国当代文学给予我更多的影响……因为我长期生活其中的那个世界的地理特点与文化特性，使我对那些更完整的呈现出地域文化特性的作家给予更多的关注。在这个方面，福克纳与美国南方文学中波特、韦尔蒂和奥康纳这样一些作家，就给了我很多启示。换句话说，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描绘独特地理人文特性的方法。”^③描绘独特地理人文特性，是少数民族汉语作家描写少数民族这个独特地理中人文特性的基本方法。还有很多少数民族汉语作家吸收现代、后现代文学的创作方法进行创作，有的采用象征、隐喻、魔幻等手法，描写少数民族的颇具象征意味和神秘色彩的历史和现实，比如蔡测海的《茅屋巨人》就用茅屋巨人象征湘西古老的文化；有的采用意识流手法，不再采用线性的现实主义方法，而是按照心理流程不断转换叙事方式，比如蒙古族作家王书林的《血恋》就采用意识流手法，用叙述者的心理流动回忆悲壮的历史，时空不断变化，给人以真实与神秘交织、历史和现实交织、生活亦真亦幻的感觉。

二是新时期的少数民族汉语作家在寻根文学思潮中，受拉美文学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拉美文学的滋养开启了少数民族汉语作家对本民族的寻根之旅。阿根廷的博尔赫斯、秘鲁的略萨、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等描写自己民族、地域独特文化的作品开启了新时期的寻根文学之旅。对汉族作家而言，寻根文学主要描写各自的地域文化，比如韩少功描写楚文化、李杭育描写吴越文化、贾平凹描写秦汉文化等。而少数民族汉语作家则在拉美文学的影响下，开始由一味地学习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转向寻找自己的民族文化之根，他们发现，基于本民族的文化写作，追溯本民族血脉、描写本民族文化可以超越亦步亦趋学习西方文学的局限，可以对自己的民族文化进行更为深刻和更为清醒的描写。可以说，在 1990 年代以前，少数民族小说汉语写作主要是向汉族文学学习，不断地追随汉族文学发展思潮。但是，在寻根文学思潮中，少数民族汉语寻根小说已撑起寻根文学的

半壁江山，已和汉族作家并驾齐驱，甚至在有些方面还超过了汉族作家的创作。比如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对鄂温克族文化的追寻，阿来、扎西达娃对藏族文化的追寻，张承志对回族文化的追寻，朱春雨对满族文化的追寻，李传锋、叶梅对土家文化的追寻等。又如扎西达娃就学习胡安·鲁尔福、马尔克斯、马利奥·略萨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学作品，采取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描写西藏文化，打破时空顺序、打破幻觉和现实的界限，引导读者进入藏族文化氛围中。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西藏，隐秘岁月》《去西藏的路上》等小说将西藏神秘的藏传佛教和原始苯教文化、浓郁的藏族民族风情、纯净高远的高原自然环境结合起来，将神话、历史、魔幻、虚构、过去、未来等因素杂糅在一起，将西藏世界描写得亦真亦幻。扎西达娃并不是将魔幻色彩主观化，然后强加在他的藏族小说中从而远离藏族文化，而是运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在藏族文化的内核中，找到藏族文化内在的文化心理，展示藏族文化深层密码。这些少数民族汉语作家通过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追寻，超越以往少数民族文学只是对少数民族风情风俗的描写，而深入到本民族的文化内里，通过小说表达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热爱之情，传承和传播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的寻根小说开辟出少数民族小说汉语写作的新途径。同时，少数民族汉语作家在寻根小说思潮中，找到了少数民族小说汉语写作最具特色的策略，那就是追寻少数民族血脉，追寻少数民族之“根”，这种“根”，便是少数民族文化之“根”。“根”即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从以往的在少数民族小说中作为背景和陪衬的地位，一跃成为少数民族小说的主角，从而超越了以往少数民族小说汉语写作仅仅限于风俗风情描写的局限，进入到文化描写的深层次表达之中，从而提高了少数民族小说汉语写作的水平。

少数民族汉语作家的三重文化素养，构建了少数民族汉语作家独特的写作资源和写作内涵。本民族与汉民族的文化素养的跨越和交融，天然地形成了汉民族和各少数民族文学的交往、交流和交融，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贡献。少数民族汉语作家的外国文学素养，是少数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保证。

注释：

1(3)阿来：《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作家通讯》1998年夏秋合刊。

2阿来：《文学表达的民间资源》，《民族文学》2001年第9期。